

23.



18



第四辑

云南妇女运动史资料

云南省妇女联合会编



女烈士孙兰英 (1927—1948, 11, 18)



女烈士席淑筠
(1930—1950, 1, 6)



女烈士俞寿婉
(1929—1950, 1, 11)

AWP/1726/3

目

录

- 和纺织工人一起战斗……………陈新民（1—13）
- 草坝蚕桑女工斗争片断
……………张建华口述王石如整理（13—19）
- 吴澄烈士在狱中……………伏瑞珍（19—24）
- 女生军训大队在双塔寺的斗争……………王静贞（24—31）
- 昆华女中的抗日救亡运动
……………李寿珍 张清兰 范立华（32—40）
- 读书会哺育我成长……………吴维之（41—45）
- 妇女要解放 全靠共产党……………金 琰（45—56）
- 忆“一二·一”运动……………沈 瑞（56—61）
- 俞寿婉烈士永垂不朽……………立涛婉（61—68）
- 在革命道路上迈进一步……………吴维之（68—74）
- 深切怀念孙兰英同志……………刘 绮（75—77）
- “偷”图记……………聂映仙（77—80）
- 小米、马金花永远活在人们心中……………张淑静（81—87）
- 滇中丹娘——席淑筠……………陈春芳 施 泳（88—100）
- 滇桂黔边区罗盘区妇女运动简况……………甘廷芳（101—111）
- 悼念曹文英烈士……………施 泳（111—116）
- 忆施兰……………施 泳（117—121）
- 云南早期的妇女运动……………朱惠娥（121—137）

和纺织工人一起战斗

陈新民

一九四八年，解放战争从防御转入进攻，把国民党企图破坏解放区的战争推向国民党统治区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，在党的领导下，掀起了反内战、争民主、争自由的民主爱国运动。这就是毛主席称之为解放战争的第二战场。动员人民配合解放战争，打倒蒋介石，解放全中国。地下党在昆明的工作，由城市转移到农村，由学生运动转移到工人运动中，以知识分子起桥梁作用，组织党员和学运中的积极分子深入工厂和农村，发展党的组织，开辟新的战场，积蓄革命力量，沉重地打击反动派。省工委派陈盛年同志领导云南纺织厂的工人运动。

一九四八年三月，地下党昆明市委决定派陈晓曙、许维亚和我三名女学生组成党小组到云南纺织厂工作。我们按照市委书记陈盛年同志的指示，改名换姓，背着家庭、离开学校，踏上新的征途，到云南纺织厂当上了纺织女工，成为纺织战线的新兵。陈晓曙在补习学校当缮写油印员，许维亚在纱厂当检验工，我在布厂当整理工，直到昆明解放前夕，我们自始至终都在陈盛年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。

(一)

云南纺织厂座落在昆明市南城外西岳庙2号，原玉皇阁旧址。该厂由云南省经济委员会（伪省府官僚资本管理机构）投资兴建，于1939年秋开工投产。伪省经委主任缪云台（又名缪嘉铭）任云南纺织厂董事长，金龙章任厂长，朱健飞任副厂长。当时该厂有英国制造精纺机24台，计4800个纱锭和英国制造织布机一百台。在古老的昆明城，建起了机器生产的纺织工业，对云南地方的财政经济起着重大的促进作用。云南纺织厂开工后，成为都市繁荣的宠儿，厂方勾结奸商，牟取暴利，使云南纺织厂的资本急剧增加，被统治者看作一棵摇钱树，工人受着残酷地剥削和压迫，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，资本家发了大财。

这个厂是女工比较集中的地方，他们的地位比男工更为低下，命运更为悲惨，资本家对女工控制十分严格，不准男女接触，不论在生产区或生活区都不准互相交谈，每星期只能外出两次，出厂门还要搜身，工头们乘机对她们进行人身污辱。还规定不准女工结婚，一旦发现就开除。因此，结婚对她们来说是灾难，是失业。有的偷着结了婚，怀孕后害怕被发现，只得用布带裹紧身子，为了保住饭碗，临产也不敢请一天假，有的把孩子生在厕所里，有时甚至把胎儿闷死在肚子里。在社会上更是遭歧视，被称为“棉花小姐”，受尽流氓凌辱。女工们抬不起头，只怨自己命苦，横竖是没有出路，有人竟想出家当尼姑，每逢旧历七月十五“鬼节”晚上，躲着去烧香，悄声哭泣。在她们中流传着一首歌谣：“前世不孝爹和娘，今世打入纺织厂，头上顶着毛毛雨（指

布厂喷雾），脚下踏着烂泥塘。”倾诉着女工们日夜艰辛劳累还换不来丝毫希望的命运。她们的悲惨境遇，使我们暗自下定决心，要为受欺凌受压迫的妇女解放做好工作。

（二）

进厂后，我们采取公开与隐蔽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活动，把工人团结起来。公开的有工友补习学校，车间生活组，同乡会，上厝会等。半公开的如读书会，不公开声张，不是志同道合的就不通知参加。

由于我们本身也是工人，和她们一起劳动、生活和学习，很快就同她们交上了知心朋友。先是组织她们在经济上互相帮助，对生病或有特殊困难的工人，我们发起募捐救济。如童工严桂芬患伤寒病，大家凑钱去她家看望，她母亲感动得掉泪不止。这些活动，使她们看到集体的温暖和力量，成为我们开展政治教育的突破口。

这个厂不断从农村招雇廉价劳动力，而农民没有文化，又没见到过机器生产，在培训和生产管理上带来不少麻烦。因此在厂里开办了工人认字班。一九四六年中共地下党员孙起孟、刘宝萱、孙仲宇等同志对上层进行了多方的教育和争取工作，由中华职业教育社推荐王士新同志到厂举办工友补习学校，由地下党所经营的康宁书店、进修书店提供大量革命书刊和文化教材，在工人中广为传播。我们抓住这个阵地，除提高工人文化外，还进一步加强思想教育，宣传马列主义。

学校负责人王颂陶，思想进步，地下党吸收他入党后，在教育提高工人觉悟方面起了主要作用。他编选的教材内

容，既是文化课，又是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史，他还通过生动的事例，深入浅出地讲解了革命道理，如讲到剥削与被剥削的时候说：“有工具的人不做工，做工的人没有工具”。工人李树岳说：“这个道理给我印象最深，使我懂得了工人养活资本家，资本家靠剥削工人而养活他们自己的道理。”在社会发展史中，他又讲到任何剥削阶级都经过产生、发展和灭亡的过程，但是必须经过革命才能促成它的灭亡，就象一堵要倒的墙一样，要有人去推它才能倒，使大家懂得了要推翻剥削阶级，必须起来革命的道理。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，他敢于公开宣传马列主义，是冒着杀头危险的。大家深为王领陶同志在学校呕心沥血以及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所感动。

经过学校教育，很多工人从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到会写自传，写批判文章，揭露资本家压迫剥削工人以及国民党的反动统治，同时还能阅读革命书籍。于是我们在学校进一步组织读书会，写作班，组织专题讨论。如《包身工》一文的讨论，对工人启发教育就很大。在传播革命书籍方面，当时流传的如《新民主主义论》、《整风文献》、《论联合政府》、《王贵与李香香》、《小二黑结婚》、《李有才板话》、《李家庄的变迁》、《茅山下的斗争》等，我们都介绍给工人看。在学校教育下，工人们觉悟提高很快，成了自觉的革命者。

我们还利用节假日，过年过节等机会，由学校出面组织各种形式的活动，把工人吸引到学校来，扩大群众队伍。如“三八”国际劳动妇女节，就组织工人座谈，向他们讲解“三八”节美国芝加哥女工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，

“五一”劳动节，就组织文娱晚会，选唱革命歌曲：《团结就是力量》、《唱出一个春天来》、《青春之歌》、《山那边哟好地方》、《豌豆秧》、《新民主主义大道上》、《纺织女工之歌》等等，也选一些抒情民歌如《阿拉莫汗》、《拍拍手》等。还演出活报剧《他们不要瞎子去当兵》以及解放区的秧歌剧《一朵大红花》、《兄妹开荒》、《朱大嫂送鸡蛋》……。过年过节还举行各种形式的演讲会，讲时事，讲故事，发动工人出壁报，举办画展及游园等活动，特别是灯谜会，由学校出面请进步的职员出字谜，捐献礼品。猜对的都发奖，奖品也是多种多样的，有书，有笔记本，有铅笔，这个活动最能吸引人，最热闹，最受欢迎。

通过以上活动，大多数工人更加团结了，而那些资本家的亲信，眼看着进步职工被吸引到学校周围；他们也想争夺工人，争夺学校这块阵地。宿舍管理员王历山提出要在学校举办舍长训练班，强迫工人学习所谓宿舍管理制度，还提出要在学校讲“三民主义”课。我们依靠了组织的力量，一方面发动工人拒绝参加学习，另一方面利用资本家贪婪的心理，由布厂保全科长提出开办技术训练班的方案，被资本家采纳了。舍长训练班告吹。他们还不死心，变换手法以陈作华为首，拉拢部份工人、职员组织了京剧社，在精纺科，以俞乃夫为首，组织歌咏队，他们唱的多是《送君歌》、《青青河边草》、《毛毛雨》等靡靡之音。我们的歌咏队唱的是时代的声音，有朝气，充满活力，是战斗的能鼓舞人心的革命歌曲，不仅吸引了大部份职工，连原来参加俞乃夫歌咏队的人，也纷纷被吸引到我们组织的歌咏队来了。他们组织的京剧社，歌咏队也就不宣而散了。

资本家的代理人——工厂经理朱健飞，他为了竞选伪国大代表，捞取选票，打出了“劳工神圣”的旗号，辞去经理职务，任总工程师，摇身一变成了劳方的代表。朱健飞出于政治上的需要，组织起“棉纺工会”，自任理事长。下设三个分会：裕滇纱厂为一分会，西山纱厂为二分会，云南纺织厂为三分会。他为了控制伪棉纺工会，不仅安插了亲信金家恕、贾昌谷等作为理事，工会秘书付士俊是国民党省党部直接派来的，工会的领导权实际上是控制在资本家手里。为了斗争的需要我们下决心把伪工会的领导权夺回到工人手中，使之真正为工人谋福利，把工会变成为领导工人开展斗争的公开合法的组织。我们抓住了三分会改选干事的机会，把在群众中有威信的，敢斗敢闯的党员、盟员（新民主主义工人同盟）作为候选人。先在党盟组织内讨论酝酿，然后再通过党员盟员向群众宣传酝酿、统一思想，形成选举的优势。结果，我们选出的候选人全部当选，获得了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选票。十一个干事中有李树岳、沙惠珍等八个党员、盟员，另外三人是争取教育的中间力量。由于党盟员占了绝对优势，因此在讨论问题时，总干事杨启荣也只得服从多数人的意见形成决议。从此，伪工会三分会的领导权实际上掌握在地下党的手中，工人们称之为“白旗红心”的三分会。为我们领导工人开展各种斗争，又创造了有利的合法条件。

（三）

我们在云纺的斗争，是根据“有理，有利，有节”的原则组织工人开展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。通过经济斗争教育

团结广大群众，锻炼积极份子，为政治斗争打下基础。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，明确了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的任务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同时开展起来。

蒋介石发动的全国规模的反革命战争，打了一年之后，全国形势起了根本变化，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上节节败退，国民党统治区经济上迅速崩溃，物价飞涨，一天早午晚三个市价。他们发行了金元卷，也未能挽回其危机，更加速了货币的贬值。这样，我们组织了要以纱价折算工资的斗争。当时我们的口号是“生产什么要什么。”由于口号提得符合广大职工的利益，连职员也支持了这个斗争，很快就形成全厂职工的共同要求。我们首先在伪工会中由组织成员提出问题，要求总干事召开紧急会议讨论，并选派工会代表童怀仁，刘桂芬等到办公室向理事长朱健飞提出要求，而在场的付士俊还想威胁工人代表，他说：“上海工人罢工挨饿了！”代表们当即给予回击，警告他“造谣吓不倒工人阶级。”由于工人代表寸步不让的决心，朱健飞害怕事态扩大，被迫接受了工人的要求。因为战局的急转直下，国统区市场一片混乱，纱价跌落，左右市场的是大米。工人们苦了一个月还买不到一合米（八合等于一升，一升等于十四市斤）。随着形势的变化，我们又组织工人，要求以米价折发工资。由工会代表直接找朱健飞谈判，并对他说：“要是不同意，工会就要下命令罢工！”朱健飞迫于形势的压力，只好同童。这两次斗争的胜利，显示了工人团结起来的力量，工人生活得到了改善，斗志更加旺盛了。

工厂里，职员和工人的待遇非常悬殊，职员发的厂服是毛呢，而工人的厂服则是自产的平布。我们抓住发厂服的时

机，要求提高厂服质量，发给男工卡机布，发给女工阴丹士林布（这是当时的上等布），同时要求发给缝工钱，由工人自己到厂外订做。这项要求，先在工会酝酿讨论，最后以少数服从多数，形成决议，提交棉纺工会理事会讨论。在理事会讨论时，虽受到金家恕等人的反对，但工人代表寸步不让，并质问他们为什么职员发毛呢，而工人却只发本厂生产的不兰不白的平布？他们无言可答。接着就召开群众大会，叫朱健飞听听群众的呼声，看看工人的力量。在群众的压力下朱健飞被迫答应了提出的要求。不久厂方就按质按量把布交给工会，由工会分发给工人，拿到厂外订做。

在改善工人伙食方面，利用有利时机成立了膳食委员会。一九四九年五月的一天，厨房给上中班的工人吃臭皮蛋。本来工人的伙食就很差，加上臭皮蛋，就激起了工人的怒火，在共产党员胡从义的带领下，质问伙食管理员：“工人的伙食费到哪里去了？为什么以坏充好？臭皮蛋不是人吃的，这是不把工人当人看！”大家一致要求立即换菜，否则吃不饱饭就不上班，在工人们的合理要求和厨房工人的配合下，重新换了菜。一向蔑视工人的王历山只得灰溜溜地离开了食堂。我们抓紧时机提出工人要求参加管理伙食，成立膳食委员会，监督伙食管理人员改善工人伙食，选出沙惠珍为膳食委员会主任委员，并决定每天派两名工人参加采购和膳厨。于是工人伙食有了改善，工会和工人的关系更密切了。

经济斗争的不断胜利，工人觉悟日益提高，促进了斗争的深入发展，斗争的目的转到了在政治上狠狠打击那些顽固份子的活动，首先对《棉纺工报》展开斗争。《棉纺工报》是资本家把持的舆论喉舌，他们利用这块阵地制造反动舆

论，企图麻痹工人斗志，并污蔑辱骂工人。一九四九年六月，工报刊登了苏正龙、龚玉清写的短文，污蔑工人是土包子，说什么“工字不能出头，工字出头就变成土字”等等，激起了工人们的公愤，工人们及时写了文章回击，从政治上解释“工”字：“工字能顶天立地，工字上头加一横是王字，王字加一点是主字。”阐明了工人阶级出头之日就要成为国家的主人。付士俊不敢刊登这篇文章，我们便抓住这个时机，通过工会小组长把报纸收集起来全部退回去，并向付士俊提出：《棉纺工报》是工人自己的报纸，必须有工人参加编辑。付士俊无言对答，紧接着，我们进一步组织赶走付士俊的斗争。由工人代表童怀仁、刘桂芬、秦玉玲、台玉英等七八人到朱健飞家，向他提出：“付士俊不是工人，不能代表工人利益，没有资格担任棉纺工会秘书。”朱健飞当然不敢答应。这次斗争的目的是要把三个分会的工人紧紧团结起来，赶走顽固分子，控制棉纺工会。在控制理事会的前提下，准备在第二届理事会成立大会时，公开提出赶走省党部的特派员付士俊的要求，如果不接受群众要求，就向国民党政府请愿，还准备好了大标语，形成斗争声势，对顽固派施加压力。可惜这次行动，由于我们组织不严，事前泄露了消息。付士俊知道后，就暴跳如雷，扬言要在大会上抓异党分子。在这紧急关头，我们召开了紧急会议采取对策，一方面揭露付士俊诬蔑工人代表是异党分子，说他是破坏成立大会的罪魁，另一方面三分会代表拒绝参加大会，以示抗议，并要求朱健飞必须保障代表们的人身安全。由于三分会代表拒绝参加会议，得到其他两个分会支援，棉纺工会第二届理事会的成立大会就此夭折了。

这时，解放战争的形势越来越好，大军渡过长江后，便大踏步地向西南进军。地下党对卢汉的政治斗争取得了很大成效。一九四九年七月，昆明市一片和平解放的声浪，根据市工委的指示，云南纺织厂党组织立即行动，由王士新和唐用九两同志拟定了厂务管理委员会章程，经陈盛年同志批准，发动群众为争取工人管理工厂迎接解放而斗争。通过多次的谈判和斗争，朱健飞看到了工人的力量强大，担心工人会把他们赶下台，竭力主张将厂管会改为厂务决策会。为了争夺管理权监督厂方，我们采纳了他们的意见，发动全厂职员和工人选举了职工代表，正式成立厂务决策会，由金龙章、朱健飞和财务处长沐仲三代表厂方向厂务决策会报告资产财务状况。在工人得知厂方在厂务会成立前，他们借口应变发“应变费”准备变卖库存的布机和机件，抛售仓库存储的棉纱后，党组织立即发动党员和盟员以厂务会职工代表的名义，组织工人看守仓库，提出不准转移和倒卖资产的斗争口号，同时，散发了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，从而制止了厂方变卖机器的罪恶行径。不久，“九·九”事件发生，厂务决策会还来不及行使职权，就停顿了。

(四)

一九四九年八月，蒋介石企图把云南作为垂死挣扎的基地，选使卢汉接收他的嫡系部队和特务骨干进驻昆明。特务头子毛人凤一到云南进入昆明后，就对昆明人民进行大镇压，宣布了所谓“九·九”整肃令。一两天之内，工人、学生、记者、民主人士和地方上层等各界爱国人士四百多人被捕入狱。在市工委的领导下，事变发生前，我们已作了较为充分

的思想和组织准备，为了保存革命力量，将处于一线已暴露的同志有计划的转移到游击队，二线同志留厂坚持工作，坚持斗争。九月十一日我们得知，工会理事长朱健飞、人事科长王士新十号被捕。在这次斗争的紧要关头，党员们不畏强暴，坚守岗位。为了避免损失，采取了紧急措施，一方面对有怀疑的人员加强监视；另一方面选择隐蔽的地方，把准备上班的同志也叫下来。因此，敌人进厂后，我们的同志从容不迫，在群众的掩护和帮助下，女工们分别上了屋顶和水塔，避免了较大的损失。李树岳同志是留厂坚持工作的，在上中班时不幸被捕，童怀仁同志虽已撤离工厂，却仍在家里被捕了。

九月十二号早上，我安排了厂里的工作，由宿舍管理员朱若兰开了出门条离开了工厂，并设法找到陈盛年同志，汇报男工李树岳、童怀仁被捕的情况，以及女工采取隐蔽免于损失等。在陈盛年同志的指示下，我和沙惠珍、李光琦、施佩珩、陈凡、秦玉玲、台玉英等十五人，先后离开工厂，转移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第八支队和滇中独立团。陈凡、秦玉玲、台玉英三位同志在革命战争中光荣牺牲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。

我们走后，工厂工作由张桂珍、李育才同志等领导；由于有的同志被捕，有的同志转移，工作更艰苦了，他们毅然领导党员、盟员及全厂职工坚持斗争，直至顺利完成军事接管和恢复生产。

（五）

云南纺织厂的党组织，是在长期斗争中不断提高工人觉

悟的基础上建立的，在组织发展的推动下，把斗争一步步引向深入，党的组织又在斗争中发展壮大。

我们从一九四八年三月进厂，到一九四九年三月陈晓曙同志赴京，前后整整一年。一年来，我们以工人身份作掩护，和工人处于同等的地位，因而很快和工人交上了知心朋友，在生产、生活和学习中，真正做到互相鼓励、互相帮助、互相支持、互相提高，所以我们能较顺利地进行组织建设和发展工作。不到半年的时间，就在女工中首先建立起党的外围组织“新民主主义工人同盟”（简称工盟），发展了一批先进工人如沙惠珍、张桂珍、秦玉玲、杨淑媛、刘桂芬、王丽芬、郭文英、江淑华、严桂芬等。

组织发展工作还有另一条线，通过云南大学的党组织发展王颂陶同志入党后，由王颂陶负责男工工作，首先发展胡从仪、张自旺、李树岳、童怀仁、李育才、陈凡、潘庭英等为中共党员。

一九四八年底，开始在工盟组织中，发展党的组织，首先对在实际斗争中经过考验，有觉悟并在工人中有威信的盟员进行培养。上述盟员中绝大多数人都在第一批加入了党组织。从此，云南纺织厂第一次有了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，并建立了男工支部、女工支部。女工支部由陈盛年同志直接领导，男工支部由王颂陶领导。一九四九年三月，陈晓曙同志被选为国民党统治区纺织女工代表，到北京出席全国第一次妇代会及青代会。她走后，党组织又从学校中抽调李光琦、施佩珩两同志到厂加强工作。一九四九年五、六月份，厂里成立了党的总支，男女支部统一起来了。全厂党员由开始几个人逐步扩大起来，到“九·九”事变前共有党员三十人，工盟盟员

二百三十七人。至一九五〇年三月，在一份统计材料中表明，已有党员一百一十四人（包括参加边纵的十五人），其中工人党员八十六人；工盟盟员三百六十二人，其中工人三百一十七人。党、盟员的绝大多数是工人，他们经过斗争的考验和锻炼，有的在游击战争中英勇牺牲了，有的在国民党的监狱中毫不动摇，坚贞不屈，多数成为党的干部。在解放初期，各方面需要大量干部的时候，领导上从厂里抽调了大批党员、盟员到省市有关单位工作，他们在各条战线上勤勤恳恳，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，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，有的还在领导岗位上挑起了重担，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，充分证明了他们不愧为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。

草坝蚕桑女工斗争片断

张建华口述 王石如记录整理

党派我去当工人

人民解放军经过了辽沈、淮海、平津三大战役，解放了长江以北地区，为贯彻毛主席《将革命进行到底》的指示，以排山倒海之势，向江南进军。在此形势下，为配合解放军进军华南和西指，滇南地工委根据省工委的指示，派出一批党员和“民青”成员到工矿和农村，放手发动群众，壮大人民力量，利用各种形式向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斗争。

草坝蚕业公司是官僚资本在蒙自开办的最大的一个企业，拥有一定的设备和固定资产，有六七百名职工，男工挖地栽桑，女工养蚕。由于养蚕的季节性很强，资方按季招收新工，尔后又随意解雇，工人受苦很深。特别是女工，更受着公婆、丈夫和资方的几重压迫。

女工们大部住养蚕房子，楼下养蚕，楼上住人，又闷又热，卫生条件很差。由于互相传染，全厂女工都生疥疮。做杂活的女工，有的成天站在臭水沟里洗簸箕，有的用稻草编蚕簇磨破了手指头。养蚕季节，工人们要连夜给蚕喂桑叶，有时忙得一夜不能睡觉。有的小童工疲劳过度打瞌睡，就要受领班的打骂。

蚕业公司发给工人的工资，经过七扣八扣还不够伙食费，很多女工每天吃煮洋芋过日子。资方不管工人的死活，还几个月不发工资，到年底时发给每人两把丝，抵着回家的路费。有的女工提着两把丝在火车站上卖不出去，只有坐在那里哭泣。

为了发动蚕业工人起来与资方开展斗争，经谢嘉麟同志（当时任滇南地工委委员、蒙自县委书记）与我党个旧县委研究，决定由个旧派两名党员到蚕业公司做工运工作。

一九四九年四月，个旧县中地下党员张月如同志找我谈话，要我到草坝做女工工作，公开身份是去当女工，党的关系由蒙自地下党的同志帮带。我因在学校中受党组织的培养教育，有一股革命热情，且家庭经济不允许继续升学，就接受了这一任务。当晚由组织上指定的一位穿长衫的先生（解放后才知道他叫赵希克，是蒙自地下县委副书记，王反运动被错处，六二年病故，现已平反，宣布无罪），带我乘火车